

揭历史真相，补刀快狠准！

告诉你最真实的竹林七贤，原来并非圣洁！

深入剖析神坛下的尧舜禹，原来只是一个传说！

详细解说悲剧式的林则徐，原来做与不做都是错！

零距离接触傲骨诗人李白，原来“天子呼来也上船”！

解密敦煌石窟罪人王道士，原来他已尽了自己的责任！

被流放的爱国者

王重旭◎著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被流放^①的爱国者

王重旭◎著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
·广州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被流放的爱国者/王重旭著.—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
2015.3

ISBN978-7-218-09935-4

I. ①被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
IV. ①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02427号

BEILIUFANG DE AIGUOZHE

被流放的爱国者

王重旭 著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 版 人: 曾 莹

策 划: 肖风华 向继东

责任编辑: 温玲玲

封面设计: 友间文化

责任技编: 周 杰 黎碧霞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 话: (020) 83798714 (总编室)

传 真: (020) 83780199

网 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 刷: 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4.75 字数: 188千

版 次: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9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020-83795749) 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5240

序

王重旭

这部书稿，最后是在北戴河中国作协创作之家完成的。

八月的北戴河正是休闲度假的好时节，美丽的海滨游人如织，快乐如同跳跃的浪花。北戴河我以前来过多次，但这次感觉大不相同，一个是这个小小的海滨城市更加美丽了，一个是这个城市里俄罗斯游人突然大增，尤其是俄罗斯姑娘，她们的美丽和开放，为北戴河增添了不少异国风情。尤其是晚上，坐在步行街的椅子上，海风吹来，街灯摇曳，身着泳装或飘逸长裙的姑娘，快乐追逐的孩童，满脸幸福的老人，从你的眼前走过，你会觉得这世界真的如梦如幻了。

当然，我还是抽时间来完成我的书稿的。其实，在家的時候，书稿已基本完成，但是，基本完成就不算最后完成，因为我写东西，虽然每一篇都独立成章，但不到最后全部完成，不能定稿。其原因就是自己很不自信，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观点能否站得住，不知道自己的引文是否准确，不知道文章是否顺畅，不知道字词是否有差错。所以，许多文章写了很长时间，沉淀了很长时间，然后又反复思考、校对和修改了很长时间，这才敢出手。这次到北戴河，就是利用下午或晚上的时间，把已经写完的稿件，又重新审订一遍，这样心里才有了底。

写作对我来说，已经感到特别辛苦了，有时很疲惫。一篇短短的

《秦始皇的盛世情结》，把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不知读了多少遍，才勉强把时间和事件搞清楚。而一篇《天子呼来也上船》，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。一篇《岳阳楼别记》，所读的资料，不计其数。别人游览圆明园，几天工夫，一篇精彩的游记便已见报，而我，读书半年，还不知从何下笔。就是网络下载的材料也不下几十万字，这样反复看，反复对照，归纳材料，寻找论据，累得头昏脑胀。

以前曾说：“写作是快乐的，思辨是快乐的。”但这部书稿完成之后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写作不是快乐的，思辨也不是快乐的。瓜田先生曾说我的文章有些沉重，的确是这样，虽然我也在极力改变，但收效甚微。因为我没有力量搬去压在我心头上的那块历史的巨石，所以，发现真相之后难免沉重，看到人们对真相的不屑和对假象的认同则更加沉重。

有人问我，你文章的那些题目都哪来的啊？其实，只要思考，便有写不完的题目，因为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并不是历史本身，只要我们设身处地，只要我们还原历史，甚至进行比较，就会发现别人告诉我们的历史，其实并不是历史本身。甚至有些时候，历史给我们的疑点实在太多，只要你对每一个接触到的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，悄悄地问一句为什么，轻轻地去揭开它的面纱，你就会发现这里面大有文章可作。

在朋友和家人的眼里，我是一个强者，可是我自己知道，我的力量实在有限，虽然这个世界暂时还没有改变我，但我丝毫也改变不了这个世界。

2014年11月6日



目 录

人间何处觅清流 / 001

并非圣洁的竹林 / 010

天子呼来也上船 / 023

走下神坛的尧舜禹 / 046

秦始皇的盛世情结 / 064

被流放的爱国者 / 071

激情下的谎言 / 077

以罪人之身上路 / 087

血染的风采 / 102

想说爱你真的好难 / 115

教之未必成尧舜 / 136

给我一个理由 / 143

白云空载天一阁 / 149

悲情圆明园 / 158

佛光里的道士塔 / 177

冬日长城 / 182

岳阳楼别记 / 195

红消香断有谁怜 / 205

花开花落两由之 / 216

美人犹自意嫌轻 / 222

人间何处觅清流

“清流”一词，大概是相对于官场的混浊而来的吧。

当年唐太宗挥舞起科举的指挥棒，让天下士子围着他团团转。于是他老人家拈须微笑，洋洋得意地说：“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。”

然而，相对于官场的浊流，中国的士大夫中还有一股清流，这股清流虽没有成为滔滔之势，却也是细流涓涓，流淌千年，绵绵不断，在中国的历史上纷呈异彩，让史学家们大书而特书的。

应该说，中国官场上的这股清流，源远流长，如果追溯源头的话，最早应该是许由了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对许由只写了一句话，“尧让天下于许由，许由不受，耻之逃隐。”话虽少，但我们却可以隐隐约约地感觉到，先人许由认为当官是一件耻辱的事儿。但让人不解的是，尧的时代，实行的是一种禅让的制度，选天下有德之人，经过考察，然后把帝位传给他，这应该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。可许由不但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，坚辞不受不说，还偷偷地跑掉。关于许由还有一段佳话，说是许由逃跑后，尧又派人来劝说他，许由觉得这些话脏了自己的耳朵，便跑到河边，用清水来洗。这时，隐士巢父正好牵着一头牛到河边饮水，见许由洗耳，问其故，许由说：“尧欲召我为九州长，恶闻其声，是故洗耳。”巢父一听，鄙视道：“子若处高岸深谷，人道不通，谁能

见子？子故浮游欲闻，求其名誉，污我犍口。”许由傻眼了，他碰到的这位巢父才是一个真正的隐士。

后来到了夏的时候，又出现了卞随、务光两个人，商汤也是一个很有贤德的君主，商汤让位于他们，不明白他们究竟为何坚辞不受。不过，司马迁很为他们遗憾，认为他们的德行是最高尚的，可惜那些正儿八经的书中却没有记载。所以，司马迁在发愤写《史记》的时候，别忘了把这几个人写进去。在《史记》的70列传中，司马迁专门写了一篇《伯夷列传》，并把许由和卞随、务光也带上一笔，好让他们的“积仁洁行”和高风亮节名垂千古。

于是，伯夷和叔齐就成为史书中第一位“清流”者了。

伯夷和叔齐生活在商代，他们的那个小国叫孤竹国，父亲叫孤竹君，名字够雅的。本来孤竹君是安排叔齐为国君的，可是，等孤竹君去世后，叔齐说什么也不肯即位，他觉得应该哥哥当国君。但是哥哥怎么能当呢？当初父亲就没那个意思，压根就没看上自己，如果现在坐上君位就是违背父亲的意愿，就是大逆不道，就是厚着脸皮，就会让天下人耻笑。所以伯夷坚辞不就，并对叔齐说：“如果你坚持让我做国君，那我就只好一走了之。”结果弟弟也坚决不肯做这个国君，他对哥哥说：“如果你一走了之，那我就和你一起一走了之。”于是两兄弟一起一走了之。但是伯夷的二弟还是很有责任心的，你们都走了，国家怎么办？老百姓怎么办？于是自己便做了国君。

伯夷和叔齐的做法，历史上一直争议不断。唐代的韩愈，还写了一篇文章，叫《伯夷颂》，对伯夷和叔齐的高风亮节大加赞颂。他说“若伯夷者，特立独行，穷天地，亘万世而不顾者也”，还说他“昭乎日月不足为明，崒乎泰山不足为高，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”。其评价可谓不高。

但是，韩愈的观点却也有人不赞同，巧的是，其中一位是明朝的缔造者朱元璋，一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。

朱元璋在看了韩愈的《伯夷颂》之后，心里不太高兴，本来大老粗一个，却也写了一篇《驳韩愈颂伯夷文》，不知是不是秘书代笔。这位朱天子说：“忽见颂伯夷之文，乃悉观之，中有疵焉。疵者何？曰过天地、小日月是也。伯夷过天地、小日月，吾不知其为何物，此果诬耶妄耶？”

毛泽东也不喜欢韩愈的这篇文章，不赞成“伯夷叔齐”，他在《别了，司徒雷登》这篇文章中说“唐朝的韩愈写过《伯夷颂》，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、开小差逃跑、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、颇有些‘民主个人主义’思想的伯夷，那是颂错了。”

这两个人，一个嫌韩愈把伯夷说得过高了，一个嫌韩愈竟歌颂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。但两人的意思几乎都是一样，如果都向伯夷学习起来，我手下可就无人差遣了。但不管怎样，伯夷叔齐之后，官场上的这股清流还是源源不断地流淌起来。

我国有一个节叫寒食节，这个节就在清明的前一天，其来历，就和清流有关。春秋的时候，晋国有一个人叫介子推，当时晋国的公子重耳因在国内处境不怎么好，便流亡国外，开始奔逃的那几年非常惨，先是父亲晋献公追杀，后是兄弟晋惠公通缉。搞得他非常狼狈，经常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。有一天重耳饿得都快晕过去了，和他一起逃亡的介子推便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做成汤，救了重耳一命。但是后来重耳当上国君，成了晋文公，封赏有功人员的时候，把介子推给忘了。于是介子推便背着老母到山上隐居去了。晋文公后来想起来介子推，便很后悔，派人请他下山，介子推不肯。于是晋文公便放火烧山，逼他出来做官。没想到这个介子推很有气节，抱着大树，被活活烧死。晋文公无奈，为纪念介子推，便在介子推死亡的那天禁烟火，只吃冷食，用以纪念，于是便有了寒食节一说。

春秋的时候，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，那个人就是范蠡。

如果说，介子推不肯做官多少有些和晋文公赌气的成分，那么范蠡不肯做官则是明哲保身了。范蠡在越王勾践的手下当大臣，这人足智多

谋，西施的美人计就是他想出来的。但是当越王革命成功，庆功会上却找不到了范蠡，原来人家范蠡走了，而且他还给朋友文种写了一封信，信中说：“高鸟已散，良弓将藏；狡兔已尽，良犬就烹。夫越王为人，长颈鸟喙，鹰视狼步，可与共患难而不可与其处乐，子若不去，将害于子。”不出所料，文种贪恋权位，最后被杀。范蠡不仅有远见，也很有本事，他不像伯夷叔齐，不当官只能要饭，范蠡弃官经商，成了天底下第一号的富翁。

其实，在中国历史上，最著名的清流当数晋代的嵇康那一伙人了。他们每天坐在竹林里一杯清茶，谈天说地，非薄礼教，不肯做官。尤其那位嵇康，人家山巨源推荐他，本来是要好的朋友，可他还写了一封信，把人家挖苦了一番，还和人家绝交，那封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，倒成了千古名篇。其实，嵇康不是不肯做官，只是不肯做司马氏的官。于是司马氏便找个理由，把他给杀掉了。临刑的时候，嵇康摆上琴，神色自若，奏一曲《广陵散》，从容赴死。嵇康的朋友中，包括阮籍以及向秀等人，也都不愿和司马氏合作，这些人都是出于一种对前朝皇帝的忠贞不贰，而对后朝皇帝的不屑一顾，他们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，于是便有了魏晋风骨。而那位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陶渊明和嵇康这些人比起来，却显得温和了许多。

看来，清流绝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式的悠闲与潇洒，其中也有刀光剑影，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。而代价最为惨烈的当数明代的方孝孺了。

方孝孺是明代第二个皇帝建文帝的老师，名满天下，而朱棣夺了建文帝的皇位之后，却非要方孝孺来写即位诏书不可。方孝孺鄙视朱棣，坚决不肯。朱棣似乎在求他，但又软中带硬地说：“这写诏书的事非先生不可！”方孝孺毫不客气，执笔写下“燕贼篡位”几个大字，然后把笔一扔，厉声骂道：“我就是死了也不会写的。”朱棣恼羞成怒，“难道你就不怕诛九族吗？”方孝孺正在气头上，想都没想，顺口就说：

“就是诛我十族又怎么样？”

和皇帝较真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，朱棣气急败坏，果然说到做到，立即派人把方孝孺的九族再加上学生，凑齐十族，800余口，当着方孝孺的面，一一杀戮。

方孝孺的气节可以说天底下再也没人可比了，但是，方孝孺毕竟言重了，面对一个丧心病狂的帝王，还是不要过于意气用事为好，因为除他以外的那800余人毕竟是无辜的，他们的想法未必和你方孝孺一样。所以，相比之下，汉朝时的龚胜就做得很得体，这个人在汉哀帝时，三举孝廉，有些名气，后来因为王莽篡逆，便归隐乡里。王莽慕其名，多次派遣使者，要拜他为上卿。开始他装病，可是王莽派的人就在那儿等着，你什么时候病好了就什么时候带你走。龚胜泡了一两年，也不能老是躺在床上不起来呀，实在没有办法，既“受汉厚恩，岂以一身事二姓”，又不能和王莽对抗，给子孙带来祸患，于是便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绝食一十四天，气绝身亡。自己死了，名节有了，儿孙也保住了。

说到这，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，这人叫楼璉，官侍读。方孝孺死后，朱棣便命他草诏，史书记载，“楼璉承命不敢辞，归语妻子曰：‘我固甘死，正恐累汝辈耳。’其夕，遂自刭。”这位楼璉没有像方孝孺那样大义凛然，但也视死如归，自杀而死，而未牵累妻小。

我想，方孝孺说过诛十族的话之后，大概也会后悔的，悔的不是自己死，而是牵连那么多无辜的人。据说方孝孺的胞弟方孝友临刑时，方孝孺泪如雨下，不知是不是心有悔意，但是弟弟的大义凛然，不在哥哥之下。其弟从容吟诗：“阿兄何必泪潸潸，取义成仁在此间。华表柱头千载后，旅魂依旧回家山。”方孝孺也作绝命诗一首：“天将乱离兮孰知其由，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，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，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，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。”

其实，说来说去，这些事用现在的眼光来看，都不是什么太大的原则问题，无非是“皇帝轮流做，明年到我家”而已，用朱棣的话说，

“此朕家事”，别人犯不着过于较真。但历史上的确有一些大是大非问题，却是含糊不得的。

拿元朝来说，很多宋代的老臣就是采取不合作的态度，不管你元朝皇帝给什么高级职务，多优厚待遇，我就是坚辞不就，宁死不屈。

有一个叫谢枋得的人，南宋文学家，进士出身。宋灭亡后，隐居闽中。元朝皇帝很看重他，多次诏他出来做官，他坚辞不就。后来皇帝派人硬是把他绑到北京，可是谢枋得坚贞不屈，绝食二十多天而死。

元朝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，叫文天祥，更是名满神州，无人不知晓。宋亡后，文天祥被俘，写下《正气歌》。元人佩服他的气节和才能，舍不得杀他，要授他高官显位，而且元世祖亲自召见文天祥，劝他投降。但是文天祥不为所动，只求一死。行刑那天，文天祥面南而跪，从容就义。他那句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，感天动地。

清朝的情况和元代有些相似，都是外族入主中原，但是他们都没有以胜利者自居，都没有老子天下第一，而是非常虚心地学习汉族文化，努力与汉族融合。尽管如此，汉族的士大夫们该拒绝合作的照样拒绝合作，该坚辞不就的照样坚辞不就。

康熙的时候，开了一个“博学鸿词科”，意思是只要有各地官员或朝廷大臣的推荐，那些有学问有才能的人，不必通过考试，就可以直接做官。但是，面对诱惑，明代的那些有名的士大夫们，照样不为所动。那位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顾炎武就拒绝出山，他说：“我这个七十岁的老头子还有什么想法吗？已经就是等死了，如果非要逼我应召，我就马上死了算了。”

还有那位黄宗羲，清政府屡次逼他出来做官，他坚决不肯，隐居家中，讲学著书，开思想启蒙的先河。还有一位叫吕留良的，清朝逼他做官，他不但拒绝，还出家做了和尚。他还写诗说：“清风虽细难吹我，明月何尝不照人。”公然表示和清廷不合作的态度。后来因卷入曾静文字狱案，被开棺鞭尸。

时代毕竟发展了，我们现在如果回过头来看，无论元代也好，还是清代也好，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大融合的一个时代。尤其现在，都是中华民族了，所以我们也就不大提起这些人的气节了。但无论如何，这股清流却永远是一个民族的精髓。

到了清朝以后的民国，这股清流越发地滔滔起来。也许是城头变幻大王旗，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关系，各种势力需要的人才多了起来，所以坚辞不就，不违心做官的人，也就渐渐多了起来。

先说黎元洪。如果说，辛亥革命一声炮响，革命党从桌子底下把他揪出来，逼他做大元帅，他坚辞不就是因为形势并不明朗，革命党能否成功还是未知数的话，那么1915年袁世凯称帝，册封他为武义亲王的时候，黎元洪能做到坚辞不就，可以说在政治上就比较成熟了，知道什么是逆历史潮流而动，什么叫不得人心。甚至袁世凯派人带全套礼仪前去宣旨，黎元洪连门都不开。

还有，民国的五位总统除袁世凯外，其他几位如徐世昌、曹锟、段祺瑞这几个人，在民族大义面前，都没有给中国人丢脸，这一点，很值得我们骄傲。

日本侵略中国后，多次邀请徐世昌出任华北政府要职，但徐世昌几请几辞。那位在中国选举史上被称为贿选总统的曹锟，虽然花钱买总统，但当日本人几次邀请他到“冀察政务委员会”任职的时候，都被他断然拒绝。他的这种精神还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嘉奖，死后被追授为陆军一级上将。还有段祺瑞，为了拉拢段祺瑞，日本特务土肥原亲自出马，但段祺瑞坚决拒绝，并离开天津，躲到上海，不和你日本人来往了。

其实，在民族大义上，我感觉人们还是容易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，尽管做汉奸的人也有，但毕竟是少数。而面对革命党的时候，人家亮出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旗，在选择上，就有些难度了。

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、教育家蔡元培，在武昌起义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，因不满袁世凯专权而辞职。后来作为北大校长，又为

抗议北洋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愤而辞职。1928年的时候，他又不愿意和蒋介石合作，辞去所兼各职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，后来国民政府任命他为监察院院长，他坚辞不就。

还有那位胡适先生，一生崇尚自由主义，蒋介石多次邀他参加政府，并施加压力，他仍不接受。他认为自己不愿做官，“理由无他，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……我不愿放弃我独往独来的自由……”而且胡适的太太也坚决反对胡适做官，胡适自己说：“有一次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，说‘千万不可做官，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！’”

说起来也真是有些怪，蔡元培左一次辞官右一次辞官，偏偏越辞名气越大，找他当官的人也越来越多。就连胡适这样坚决不肯做官的人，反倒越发地受人敬重，他不仅不做国民党的官，还常常批评国民党，但国民党却一点都没有嫌弃他。1949年的时候，共产党本来极力挽留他，让他当北平图书馆的馆长，但他还是跑到台湾，后来又到了美国。所以，后来有人批评他，说他骂国民党是“小骂大帮忙”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，各路人马纷纷进京做官去了，坚辞不就的事便渐渐少了下来，因为人民政府嘛，为人民做事嘛，你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？

可偏偏就有。

这人便是陈寅恪。陈寅恪一生恪守“自由之思想，独立之精神”，特立独行，独往独来。1953年，中央决定任命陈寅恪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。可是他却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：“第一条，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，并不学习政治。第二条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，以作挡箭牌。”听起来有点让人替他捏把汗，在那个时代，提出那样的要求，你说他是不懂还是故意刁难？在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中，居然提出不宗奉马列主义，不搞政治学习，这样的人，其实比坚辞不就还要让人不可思议了。

陈寅恪终于还是没有去，一生都在中山大学做他的教授，只是不知道他是怎样坚持他的人生准则“自由之思想”和“独立之精神”的。

陈寅恪之后，还有一个值得我们一提的人，这人就是粟裕。

1955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，设了十位元帅、十位大将。粟裕一生戎马倥偬，战功显赫，令人敬仰。但是他却不是元帅，而是大将，名列元帅之末，大将之首。所以，有不少人为他惋惜。

据《历史的真言——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实》这本书介绍说粟裕本来应该评为元帅，但是由于他自己主动请辞，把元帅让了出去，于是被评为大将。这种高风亮节，主动让帅的做法，感人至深。

李银桥是毛泽东的卫士长，他回忆道：中央几位领导在中南海讨论解放军高级将领军衔问题，讨论到粟裕的时候，毛泽东不仅要给粟裕授元帅衔，而且还给予极高评价，他说：“论功、论历、论才、论德，粟裕可以领元帅衔，在解放战争中，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？”这时周恩来说：“可是粟裕已经请求辞帅呢？”毛泽东又说：“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授衔时，我们军队中有些人，打仗时连命都不要了，现在为了肩上一颗星，硬是要争一争、闹一闹，有什么意思！”毛泽东又说：“难得粟裕！壮哉粟裕！竟三次辞帅，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，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，现在又让元帅衔，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，强千百倍么！”周恩来也说：“粟裕二让司令一让元帅，人才难得，大将还是要当的。”毛泽东补充说：“而且是第一大将。”

从几位领袖的谈话来看，粟裕作为一个元帅是够格的，但是因为让了那么一下，也就顺水推舟，换了别人。于是，粟裕之后，再也听不到有主动让官的了。尤其现在，我们看到的只有跑官要官，买官卖官，坚辞不就或主动归隐更是闻所未闻。至此，这股清流便渐渐地有些干涸了。

并非圣洁的竹林

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，这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出现过一批非常特殊的人物，而这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，这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就是魏晋时期的“竹林七贤”。

其实，中国历史上的文人群体或被称之为流派的，非常之多，像汉魏的“建安七子”、唐代的“初唐四杰”、中唐的“香山九老”、宋代的“苏门四学士”、明代的“北郭十友”等等。但是影响最大，最被人们所津津乐道，而且一听名字就让人神清气爽，心向往之的，便是“竹林七贤”了。

先不说“竹林七贤”的内涵如何，单就这个名字，人们便觉得起得好。中国人喜欢竹，视竹为君子，有气节。所以，王羲之兰亭修禊，离不开“茂林修竹”；陶渊明世外桃源，亦是“桑竹之属”；而诗人王维更是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”；到了苏东坡那儿，则更是把这竹推到了极致，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”了。

所以，千百年来，中国人，尤其是中国的文人，给予“竹林七贤”以极高的评价，像什么“正始之音”“魏晋风度”“不拘礼法”“超越名教”“放浪形骸”“恣肆潇洒”等，真是赞誉之文，连篇累牍；溢美之词，不绝于耳呀。